

前　　言

为了了解辽宁省解放前工商经济情况，研究这一地区工商经济发展历史，为在深入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经济建设中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中国民主建国会辽宁省委员会、辽宁省工商业联合会共同编辑了《辽宁工商史料》专辑。

专辑力求反映辽宁省解放前工商经济中商会的成立、活动及其所起的作用；各行业的发展史；一些闻名企业的兴衰过程以及有影响的工商人物传略和事迹。所刊史料，其中一些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内容较为翔实、具体，尤其是反映民族工商业者在长期生产经营中所积累起来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技术专长，对于当前经济制度改革，增强企业活力，搞活经济，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繁荣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专辑共收入36篇文章。《辽宁文史资料》已发表过的工商史料文章，鉴于篇幅所限，不再选入这本专辑里，只收这些文章的目录附后。

在征集编辑辽宁工商史料中，得到各市民建、工商联的大力协助，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也给予很大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征集编辑和出版工商经济方面的史料，使其专题化、系统化，更好地为四化服务。为此，竭诚希望有关部门和各界人士，尤其是过去从事工商经济工作和熟悉工商经济情况的前辈，为我们提供史料。本专辑有错误之处，请予批评指正。

编　　者

1989年4月

序 言

目 录

解放前辽宁工商业发展概述 魏福祥 (1)

商 会

- 忆参加全国商会临时代表大会 卢广绩 (24)
解放前沈阳市工商业概况 冯彻颖 (29)
沈阳工商界的反帝爱国斗争 冯彻颖 (41)
沙俄、日帝统治下的大连商会 大连市工商联 (50)

行 业 史

- 沈阳近代饮食业考略 杜宏博 (62)
大连油坊业史略 大连市工商联 (78)
大连交易所史话 唐树富 黄本仁 (98)
大连照像业史略 大连市工商联 (114)
丹东柞蚕丝绸发展简史 丹东市民建、工商联 (127)
丹东的典当行业 任剑秋 王云峰 (144)
木都安东七十年 王云峰 (149)
千金寨商工史话 抚顺市民建、工商联 (155)
解放前的营口中药业 曲志诚 (164)
锦州玉器行业的发展与变化 锦州市民建、工商联 (170)
锦州小菜 锦州市民建、工商联 (176)
锦州皮毛业 锦州市民建、工商联 (183)
阜新清河边门的工商贸易 张万明 (188)

企 业 史

- 闻名东北的萃华金店 赵瑞馥 (195)
回忆天益堂药店 张志民 (202)
润记帽店 董益三 (219)
老天合兴衰记 曲天乙 (229)
远近驰名的老世泰 顾晓泉 李 元 (246)
铁岭德盛号兴衰始末 郭兆岩 张效云 (256)
糕点名店仙露芳 王云峰 (272)
辽阳“顺字号”的兴衰 吕平一 顾晓泉 (276)
曲铁工厂今昔 闵亚兴 薛顶立 李宝新 (288)
我所知道的满洲兴业银行 孙耀庭 (293)
本溪“二合顺”的变迁 本溪市工商联 (300)

工 商 人 物

- 杜重远传略 沈阳市民建、工商联 (304)
刘凯平传略 沈阳市民建、工商联 (308)
张惠霖传略 沈阳市民建、工商联 (311)
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徐敬之 大连市工商联 (314)
安东商会会长孙荣明 丹东市民建、工商联 (326)
邵慎亭与“天兴福” 唐树富 黄本仁 (330)
姚子扬与瀛西药房 王云峰 (343)
附：
《辽宁文史资料》1—25辑有关工商经济史料的目录 (350)

解放前辽宁工商业发展概述

魏 福 祥

辽宁地处我国东北的南部，依山临海，土质肥沃，物产丰富，工商业发达，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也是东北三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辽宁工商业的发展先于吉、黑二省，但较关内诸省为迟。然而到了近代，特别是自营口开埠至本世纪初叶以后，由于社会与历史的原因及其自身优越的地理自然条件，工商各业，如异军突起，一跃而跻身于全国先进行列。

—

辽宁地处边陲，古代一直是边防要塞，和中原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联系。同时辽宁又是汉族与古肃慎、扶余、乌桓、靺鞨、渤海、室韦、契丹、女真、蒙、朝等少数民族杂居相处的地方。几千年来，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共同繁衍劳动，发展了辽宁地区的经济与文化。

考察辽宁远古时的经济活动和商业经济的起源，因年代久远，资料湮没，已难于详考，今能见诸于史籍者，当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据《史记·货殖列传》载，辽东素被称为是“有鱼盐枣栗之饶”之地。因此，自秦汉以降，乃“稍通市焉”。至隋唐以后，因海运益开，辽东盛产的米谷粳稻，已自销有余，并将其剩余的农产品，经辽河出口，远输到闽（福建）、浙（浙

江)一带。诗人杜工部曾写有“云帆转辽海，粳米来东吴”的诗句。这说明当时的辽宁地区，已成为全国的重要产米之乡，其商业活动和贸易的范围，已开始突破了地域与空间上的限制，步入了全国经济的循环圈了。明朝永乐初年(1405年)，明政府为方便辽宁地区各民族商交活动与生产的需要，令地方官府“择水草便处互市”，遂将广宁、开原广顺关、镇北关三地，辟为马市。随着生产的发展与交换的频繁，三处马市已显得不够。明万历年间，又继抚顺、清河、宽甸、叆阳等处为市。在马市上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多以其牲畜、皮毛、山珍、药材等土特产，与汉族易换“米布猪盐”、生产工具、金银饰物及各类生活用品，后金时代的女真人“岁以貂、参互市，得金钱十余万”。无疑明代马市的开设，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同时，又是连结各民族经济联系的纽带。

清建国迁都北京后，把辽宁视为满族故乡，“龙兴圣地”。为保护“龙脉”，对土地、山林、海面实行“村禁”“矿禁”“海禁”，严禁关内流民出关，不许凿石开矿，不准出海贸易。这种封闭式的倒退政策，使生产萎缩，经济萧条，工商业几被窒息。

顺治朝时，为了恢复生产，颁布《辽东招垦令》，移民实边，奖励招佃垦荒；特别是嘉庆、道光以后，“封禁”渐开，大批移民从关内各省拥入辽宁，或垦殖，或从商，生产得以复苏，商业又重新趋向活跃。

盛京(沈阳)是清朝的陪都。在这里一直保留着盛京内务府和户、礼、工、刑、兵五部，宦官成群，驻兵甚多。盛京故宫及关外三陵(永陵、福陵、昭陵)又是清历代帝王东巡谒陵祭祖必经之地与行宫所在，所以不论清朝统治者入关前还是入关后，都曾多次在沈阳建宫扩城，修坟筑陵，大兴土木。同时为了满足皇帝后妃、达官显贵们奢侈挥霍的需要，在这里汇集了数以千百计的能工巧匠和技艺高超的手工艺人，使窑业、烧

锅、造纸、冶铜、采煤、织布、首饰、木、石、瓦等各种手工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在这些手工业中以烧窑业最为突出。据沈阳故宫博物院新发现的《侯氏宗谱》记载：从清初建都东京辽阳修造八角金殿到迁都沈阳修建宫殿时的龙楼凤阁，及修清“三陵”工程，凡所用之琉璃龙砖彩瓦，皆产自海城缸窑岭官窑（黄瓦窑）。监督烧窑者就是盛京工部五品官山西人氏侯振举。彼时，琉璃窑规模宏大，设有琉璃窑厂、木炭厂、铝厂、锡厂、颜料厂、席厂等十二厂，有琉璃窑五座，最多时工匠、壮丁达六百余人，已具有工场手工业规模。海城官窑所烧制的龙砖彩瓦、绿釉碗罐，设计精美，工艺高超，色彩斑斓，在全国也堪称一流佳品。侯氏因对清建宫筑陵“报效有功”，被顺治皇帝亲授“琉璃厂世袭提督，统辖十二个千总”，从此侯氏家族也获得“荫袭世爵”的殊荣。

嘉庆、道光时期，辽南沿海的海口贸易呈现出十分活跃的状态。当时在滨海的一些地区，每年都有大批的“江南沙船、浙江宁船、天津卫船”跨海至辽东半岛，进一步加强了辽东半岛与南方各省的经济联系。与此同时，辽南沿海的较大集镇，如锦州、牛庄、没沟营、熊岳、盖平、金州、复州、庄河、魏子窝、孤山镇、大东沟、沙河镇等处，便自然形成一批海口贸易集市。象当时的盖平地方，因商交频繁，已成为“商旅云集，百货汇聚”之区。由于制钱缺乏，携带银两又多有不便，乃有天德、东来、永记、天兴、恒记等五家钱号，号称“五大磨”，于1830年（道光十年）私自印发“虚票”，代替制钱、银两流通市面。这种“虚票”是一种类似私帖性质的纸票。用它不仅可以到钱铺“兑买银货”，亦可到一般商铺“诓买银粮”。这种“虚票”除在盖平一地使用外，还流通到熊岳、岫岩一带，可见影响之大。“虚票”的流通令官府十分恐惧，1835年被查封。据查封时统计，已兑付者不算，尚未兑付而仍在市面流通者，即合东钱“三百八十三万三千余千”，折合现银“六十三万

八千余两”。流通额如此之巨，其当年盖平海口贸易之景象，便由此可见一斑了。

同期，盛京（沈阳）商业的发展也令人十分注目。据有资料可查，在沈阳地区最早出现的一批商铺有：丝房类，顺治元年（1644年）开设的兴顺利丝房、康熙十五年（1676年）山东黄县人单氏开设的天合利丝房、乾隆年间开设的永源德丝房、道光年间开设的赵兴隆丝房等。烧锅类，康熙元年（1662年）山西人孟子敬开设的万隆泉（现老龙口酒厂前身）、乾隆二年（1737年）开设的天成酒店、嘉庆三年（1798年）开设的万龙合等。药房类，乾隆四年（1739年）设有广生堂、道光四年（1824年）设有天益堂、道光五年设有春和堂，此外尚有宝和堂、万育堂等。钱业类，道光八年（1828年）山西人曹氏开设了富森竣钱庄、嘉庆十年（1805年）山东曹氏开设的广山茂佑衣庄等。

至道光末期，沈阳的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城市经济已具有相当可观的规模，并开始形成商贸活动与金融业的中心。据《重修长安寺碑记》载：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重修盛京长安寺时，各捐银160两的钱铺就有71家，捐银百两者有6家，共计有银钱业者77家，捐银9960两。现将当时参加出资捐修的商号转录如下：□增明、诚兴永、广德号、大成号、新彩成、广积恒、义古号、源盛川、乾源长、德亿顺、顺发号、增升长、聚发号、广义德、富森竣、万盛增、环庆升、广升号、德成兴、合兴乾、世隆号、协力号、万盛德、义全合、广庆长、福成永、人和号、太川兴、万增庆、三庆永、长泰源、义昌公、广集川、恒增号、庆丰长、德祥号、万盛隆、景兴号、利成号、复合德、广长森、合元贞、万全育、永源丰、集聚成、立成号、德一全、源生泰、聚来号、广成发、永和美、广亿号、广泰号、合源兴、渊泉溥、丰泰号、源和号、德川号、恒足润、广泉正、永美德、老成号、德聚隆、环庆隆、广崇亿、谦和

盛、广聚德、万升号、广盛泰、天增永、天德号，以上共71家，各捐银160两。另有聚顺德、合盛永、永发号、长隆惠、增隆公、世丰隆6家，各捐银100两。

沈阳金融业的崛起，无疑是适应城乡商品经济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在上述开列的钱号中，资本雄厚的富森竣钱庄一家，当时就有联号5处，总资本银达25万两。道光年间，沈阳有这样发达的金融市场，足见当时商业与手工业及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已发展到一定程度，沈阳已经是一个充满封建城市经济特色的比较繁华的都会了。从商业活动的行业分，主要有钱行、粮行、丝房、皮货、山货五行。此外还有借贷行、帽行、菸麻行、铜行、骡马市等。从商业品种看，有当地的粮谷、油豆，南来的丝绸、竹器，蒙古的马匹、皮毛，吉林的人参、鹿茸、东珠，辽南的海参、鱼、虾。从商人的结构看，则有山西帮、山东帮、直隶（河北）帮、吉林帮、本地帮之分。行有行会、帮有帮规，以协调各商家间的关系，维护各地商人的利益。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十九世纪中叶，沈阳人口稠密，店铺棋布，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商旅，每当清晨“鸡鸣趋市，溢郭填城”，以有易无，各求其需，呈现出一片繁茂的景象！

二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这次战争的失败，对地处边远的东北，实际并未产生多大影响。然而1858年（咸丰八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却给辽宁以强烈的冲击。当时清政府被迫签定了《中英天津条约》，开放牛庄为通商口岸。从此，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纷至沓来，侵略的魔爪由南及北伸向辽东半岛。他们在这里设洋行、开矿山、修铁路，把东北作为他们推销商品的市场、掠夺原料的基地和相互角逐的战场。中日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

时，辽宁首当其冲，危害最深，人民惨遭蹂躏，工商备受打击。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京奉铁路、中东铁路相继通车。根据1903年《中美通商条约》、1905年《中日东三省善后条约》，先后又在东北开放商埠24处，其中辽宁独占9处，加上原已开放的营口，共有10处之多。新开的商埠有：沈阳、安东、大东沟、辽阳、凤凰城、新民、铁岭、法库、通江口。辛亥革命前辽南通商贸易港有营口、大连、安东，这三处被称为“辽南三港”，此三港又都有铁路支线与京奉、南满铁路相接，轮轨交错，交通极为便利。同期，关内移民迅速增加，几乎每年移入辽宁定居者，都有数十万之众。据计：1840年，辽宁地区人口只有220万人，到1910年，增至1100万人，为原来的五倍。随着人口的增加，耕地面积日益扩大，农业生产也得以很快地发展起来，并不断加快了商品化进程。上述这些变化，为辽宁工商的发展，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

商业与贸易：营口开埠前称没沟营，尚属“滨海斥卤”的渔村小镇，只有西义顺、永远兴、天增福、仁裕、兴茂福、通顺泰6家。开埠后，面貌为之改观。1861年6月，英国最先在营口设领事馆。继之有法、德、瑞(典)、荷、日、美、俄等国，挤入营口设领。当时营口“东营子”区，就是八国领事馆的驻地。接着外国商业资本纷纷在营口开设了太古洋行、怡和洋行、美孚洋行、德茂洋行、瑞记洋行及日本的小寺洋行等。国内商人北至吉、黑，西北至东蒙，南至广东、福建、浙江、上海，西至山东、直隶、山西，无不云集营埠。这些商旅按地域划分，有所谓：“三江帮”(指江西、浙江、江苏商人)，“宁波帮”“广潮帮”“福建帮”“山东帮”“山西帮”“东北帮”(指辽、吉、黑三省商人)，当地人则称“营口帮”。上述各帮以广东、山东、营口三帮势力较大，资本雄厚。他们主要经营榨油、行栈、金融、土特产、丝绸及京广杂品类。到1866年

新开的商铺有义泰德、同兴宏、义顺华、亨泰栈、成顺号。1875年又有世昌泰、裕生源、裕生长开业。1886年有东永茂、兴记栈、宏利和、王昌栈、同兴茂、福有长、魁昌勇、丰福、永同庆、元茂盛、庆隆和、长隆泰等。到1894年，仅从事油豆业者就有30余户。1885年后，广东商人叶亮卿，在营口开设东盛和、东生长、东和昌、东生怡等。20世纪初，营埠兴有各类大小商户千余家，其中较大者为西义顺、东盛和等数家。1907年发生东盛和倒闭案时，一次就亏损白银“五百余万两”，曾震动营埠，轰动全国。这是营口民族资本因经营不善而倒闭的一例，从中也可看出营口商业资本之巨。

营口开埠后，内外贸易的发展极为迅速。1861年即开埠当年，停泊于营口的洋船仅24只，四年后增至271只，为1861年的7.7倍。1902年，到营埠停泊的外轮、民船共5824只。从贸易额看，1865年贸易总额仅380余万两，至1902年则为6100多万两，四十多年中增加15倍之多。营口的内外贸易，当时是以与关内沿海诸省的转口贸易为主，对外贸易数量很少。贸易品种以大豆三品（大豆、豆油、豆饼）为大宗，占贸易额的90%。其他有柞蚕丝、药材、皮毛、烧酒等。从外国进口的商品有布匹、棉纱、金属制品、煤油、颜料等。20世纪初，营口已发展成为东北三省唯一的海上贸易港和货物集散地，是辽宁南部重要的商贸中心。

还应当指出，营口开埠及贸易的发展，不仅使辽东半岛的经济进一步与关内诸省的国内市场经济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且开始与国际资本主义市场联系起来。东北的大豆及大豆制品，在1908年以前向国外输出的国家，主要是日本、朝鲜。1908年经日本三井物产，1909年经俄商那他逊介绍到欧洲市场。当时曾引起欧洲商人的轰动，把中国大豆称之为“粮食甘露蜜”。从此，中国大豆乃驰名于世界。辛亥革命前，营口已经与世界上近30个国家和地区，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关

系，辽宁地区的经济已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走向世界，加入了世界经济的循环圈了。当然当时还不是作为独立的经济，而是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以其畸形的状态出现于世界市场的。

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俄国，把旅大、关东州、南满铁路及附属地侵夺过去。1906年日本正式经营大连港。1907年安东、大东沟辟为商埠，1911年安奉路通车。此后，日本便以旅大为侵华的前头堡，竭力推行“大连中心主义”，采取各种措施排挤营口港。结果使东北大豆、柞蚕丝、木材等商品，逐渐转向大连、安东二港出口，贸易中心也开始从营口转到大连。尽管如此，营口、大连、安东三港，以及围绕这三港所形成的辽南经济区，对近代辽宁经济发展，是有重要影响的。

随着生产的发展，内外贸易的扩大，以及一些较大城镇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作为商品交换，流通中间环节的商业更趋活跃。各商铺店号，不仅数量有所增加，而且行业也愈来愈细。

咸丰、同治、光绪年间沈阳一地先后开设的商铺、丝房及兼营其他行业者，主要有：咸丰年间设天合东，1863年（同治二年）设天合铺，同治三年设义丰长，1875年（光绪元年）设恒兴长，光绪二年设阜丰东，光绪三年设大兴隆、福盛永及利顺永，光绪六年设德兴和，光绪十二年设恒祥源，光绪十六年设源和东、光绪二十一年设谦祥恒，光绪二十六年设谦祥泰、裕泰盛、天增福，光绪二十七年设吉顺昌、吉顺洪、泰山玉，光绪二十八年设洪顺盛，光绪三十年设英利源、和发永，光绪三十一年设顺兴义、福恒隆，光绪三十二年设德庆元，光绪三十四年设谦祥源、吉顺隆、德兴源、福盛公，宣统元年（1909年）设兴隆丰、瑞祥林等。据奉天商会统计，在沈阳开设的洋货庄、土货庄、山货庄、山货行、粮米行、鲜货行、茶庄、药铺等商号，咸丰、同治年间以前开业者仅102户，到光绪、宣统年间开设者有594户，合计696户。其他从事装表、金、木、皮革、鞋，

帽、洋蜡、洋皂、茶社及小店杂项营业者，咸丰、同治时期前有45户，光绪、宣统时期有391户。此外在沈阳四乡还设有油坊、烧锅、杂货铺多处。综上到宣统末年在沈阳砖城内狭小的井字大街两边，就开设了各种商铺千余户。

工业：辛亥革命前辽宁的工业，其主体是榨油、制酒、缫丝、纺织手工业，20世纪初，才开始有小规模的机器生产。

油坊业最早发展起来的地方是营口。道光初年就有西义顺（1822年）、兴茂福（1826年）两油坊开业。开埠后此业更蒸蒸日上。1894年时营口已有油坊业30余户。其他如海城、安东、沈阳、辽阳、铁岭等地，油坊业也较为发展。1897年英商太古洋行创立太古元油坊，最先采用机器榨油，很快怡兴源、怡东生、东永茂等华商油坊也采用新法生产。日俄战后，日商创小寺油坊完全采用机器不用人力，质量好产量高，对制油业影响很大。之后，各油坊普遍采用新法，旧式油坊趋于绝迹。

辽宁制酒业发展较早，生产的厂家（烧锅），据统计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全省共有119家。在各主要城镇普遍建立，如沈阳、辽阳、营口、锦州、铁岭、法库、海城、田庄台、凌源等地都有。其中辽阳一地就有33家烧酒，产量多，质量佳，在营口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制丝业：辽宁柞蚕丝主要产于辽宁东南部山区，如盖平、岫岩、安东、宽甸、海城、辽阳、凤城一带。因此，这些地区一般都建立了小规模的手工制丝厂家，但较有影响者是盖平、安东两处。1905年安东开设的专营缫丝的工厂七襄丝厂，有职工200人，木制小纺机170台。其他相继开业的有谦盛桓丝厂、华安丝厂、东太丝厂、正记丝厂、远记丝厂等。到1911年时，安东有丝厂约6家，有小纺机2151台。

纺织业的兴起主要在沈阳、辽阳、营口三地。沈阳1902年设诚永、天增利织布厂。1910年设邓记织布厂，有织机10架；辽阳设大业昌织布工厂，有机器20台，职工50人。1911年沈阳

又创设重盛织布厂、永顺织布厂，各有机器35架、20架。

铁工厂之设首在营口，1885年开设有义顺铁工厂，1886年设三和铁工厂，生产洋炉、铁柜等。1897年沈阳设万顺铁工厂，制造一般铁器，修理榨油机等。

公司企业的出现：1906年营口李恒春、潘达球等集资，创办自来水公司。1909年铁岭人刘东娘在沈阳创办惠工有限公司，官商合办，有资本小洋2.34万元，有职工240人。

1906年自赵尔巽之后，历任奉天将军总督，都力倡实业，先后开设官办奉天八旗工艺厂、八旗女工传习所、奉天第一女工厂、贫民习艺所、奉天监狱工厂、造砖厂、官纸局及商办的军装制造局。其中贫民习艺所生产的军刀、丝绒毯为“东西国人所乐购”。

此时，辽宁矿业的开发当处于初创阶段。据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矿政调查局统计，当时全省只有各类矿藏461处。1899年，在海城、复县、盖平等地上就开矿20余处。至20世纪初叶，民族资本办矿亦初露头角。1901年王承尧在抚顺千金寨创华兴利采煤公司，朱化东等设华兴利公司，1906年在锦西大窑沟设通裕煤矿公司，1910年设抚顺瓢儿屯煤矿公司。据辛亥革命前（1909年）统计，辽宁全省共开办金矿9处、煤矿59处，其他有采铁、铜、铅、石棉等多处，但规模小，技术还比较落后。

商业行会及商会的创设，咸丰年间即在省城沈阳出现，次为营口，产生于19世纪末叶。据英国《海关贸易十年报告》中反映，当时在“牛庄、沈阳和盖平的江苏、浙江、江西三省商人，都分别合建有三江公所。”商业公所，亦即商业公议会，乃属民间自发的商业组织。20世纪初，1903年清政府颁发《商会简明章程》共16条，首在北京创设商会，并劝谕各省成立商会。奉天将军赵尔巽，鉴于奉省商务日繁，但各帮各行之间多相互闭塞，商智未开，为苏商困，振兴实业，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奏请在辽宁设立商务总局。设局后，即派人到各

地劝办。经过约半年时间的筹备，先后在沈阳、营口、安东设三处总会，在广宁（北镇）、新民、镇安（黑山）、辽阳、海城、牛庄、田庄台、盖平、复州、岫岩、大孤山、庄河、凤城、龙王庙、太平沟、宽甸、陵街、新宾、桓仁、铁岭、开原、法库、昌图、大洼等38处，设立分会；另设立分所16处，总计50余处。创设商会的宗旨有四项：调查商情、研究商学、改良商品、协调商情。辽宁各地商会成立后，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发展辽宁商业经济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帝国主义经济渗透。自1861年营口开埠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对辽宁的经济侵略，主要是商品输出，把辽宁乃至东北作为他们推销商品的销售市场与掠夺原料的基地。甲午、日俄战争后，日、俄两帝国主义取代了其他国家，把东北视为他们的殖民地，掠夺方式由商品输出，转化为资本输出。在日本，日本从关东州、南满铁路沿线及附属地为基地，大规模地进行经济扩张。1906年日本以两亿日元为资本建立了“满铁”公司。同年，日本大仓财阀以中日合办形式，设立了“本溪湖煤铁公司”，1907年设“奉天马车铁道股份有限公司”，1908年中日合办的“鸭绿江采木公司”以及其他银行、会社、商店多处。数年间日本的经济侵略势力渗透到各个领域，为后来更大规模的对华侵略打下了基础。

综上所述，从1861年营口开埠至1911年辛亥革命，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辽宁的工商业及社会经济面貌，均发生深刻变化。帝国主义的相继入侵，一方面使农村自然经济及某些家庭手工业日益分化瓦解，整个社会经济进一步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另一方面，西方先进的文化与科学技术的传入，使辽宁地区的工商业，逐步向近代经济方向靠近，在痛苦中挣扎，在困难中摸索，毕竟开始有了新的起步。

三

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了封建专制，为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这时辽宁地区海运、铁路发达，关内移民继续大批拥向东北，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劳动力市场与商品市场。同时伴随帝国主义对东北侵略与掠夺步步加深，辽宁各地普遍掀起了挽回利权，振兴实业的开矿办厂热潮。1914年至1918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等西方列强又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也为辽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契机。因此，辛亥革命后至1920年前，短短数年间，辽宁地区工商业均有较为明显的发展。

沈阳于1912年设益记祥洋行、乾元厚、庆泰永、四合堂、隆记洋行、同益兴、大顺永、敦庆祥、兴盛合、德顺成、天利昌等商铺，1913年设志诚谦、东德昌、义增厚、源丰盛，1914年设有吉顺丝房、中顺恒丝房、永兴东、长元号、振记号、德昌永，1915年设世义顺、成泰永、同顺恒，1916年设天兴信、大德祥、金兴竣、振记工厂、德义祥，1917年设义增源，1918年设纯益织公司、顺源长，1919年设福隆顺、汇泉远德记、德兴成、恒顺东、正记布庄及同义和、同协利丝房等。

其他各地商业也发展很快。1917年，铁岭加入商会的工商业户有302户。1919年安东有大小商铺千余家，营口有商铺900余家，大连及西岗两处有900余家。该年辽宁全省计有商户3千余家，在商场上占有重要地位者，约500余家。

传统的手工业榨油、制酒、缫丝等，不仅数量增加，而且愈来愈采用机器生产。

榨油业：1917年，全省共有榨油工厂593家。榨油业中心由原来的营口转到大连。大连榨油业1910年只有35家，至1918年增到53家，一昼夜生产豆饼94600斤。1916年安东有较大机器油坊11家，1919年有新旧式油坊15家。1919年沈阳有油

坊20家，铁岭有7家。唯营口榨油业因受大连港排挤，厂家日渐衰落，1915年时尚有20余家，至1919年只剩9家。

制酒业：1919年沈阳有烧锅15家，铁岭有2家。据1915年统计，在“南满”地区共有烧锅309家。辽宁制酒业中心在辽阳，民国初年相继开设的共11家，其中规模较大者如庆发泉、永泉泰、怀升泰、永发泉等烧锅，所产白酒“风味佳绝，称冠东北”。

机器缫丝工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展很快。安东1916年时有机器缫丝厂7家，1919年共有大小丝厂蚕栈20余家。盖平有缫丝厂7家，建于大战中者6家。

棉纺织业的发展尤为突出。1913年，营口包括资本千元以下的小厂仅5家，1919年则达23家之多，“依斯业生产者不下万人”。沈阳在1914至1915年间，因排斥日货，纺织业渐盛，并开始“易手织为机械，个人组织易为公司，人之发动易为电力”，有广集成、惠工公司等大小百余家，有织机7400余架，年生产大尺布、花旗布335万匹。

制粉工业：1910年时只有机制粉厂2家，1915年时为5家，至1920年时发展到9家。

其他如造纸、火柴、饮料、肥皂等业，也相继开设。1914年设营口大兴纸厂，用美制机器造纸。同年沈阳设华利洋烛公司。1916年沈阳设饮和汽水公司（八王寺汽水厂前身）。辽宁火柴工业以营口发展最早最集中，到1919年相继设有关东、志远、三明3个火柴公司。

工业的发展扩大了对电力的需求。民国前，沈阳只有官办奉天电灯厂一家。到1919年全省有商办、官商合办电厂6家。

民办采矿业发展迅速。1915年本溪有民族资本开采的小型煤矿16家。1917年复县设铅矿公司。1917—1919年，兴城地区有金矿1家、铅矿2家、铁矿1家。1916—1920年于冲汉一人就在海城县报领矿区（铁、苦土、长石）10处。据统计1918年全省

注册发照的民办矿业 122 家。1919年辽宁全省仅煤、铁、金矿区占地面积就达 139220 亩。

张作霖统一东三省后，由于代省长兼财政厅长王永江为其赞划辅佐，全力整顿财政，倡导实业，开源节流，不数年间，使辽宁财政好转，省库充裕。到 1920 年时，省库库存结余达 1100 多万元，从而使东北出现一段相对稳定阶段。又因日本加紧侵略东北，中日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社会各界“抵制日货，收回国权”运动此伏彼起，“外争国权，内倡国货”成为人们振兴实业中的响亮口号。工商各业齐头并进，出现了一批规模较大的近代化企业。但奉系张作霖为穷兵黩武，于 1922—1924 年先后发动两次直奉战争，致使财源枯竭、奉票毛荒，使辽宁工商界深受其害，经济一度出现萎缩。战争又刺激了辽宁军事工业的发展与奉系集团官僚资本的膨胀。尽管如此，但从总体上说 20 世纪 20 年代，是辽宁省的工商业持续发展并进一步向近代化迈进阶段。

近代工业初具规模。20 年代新兴的近代民族工业，进入一个大发展阶段，有些已初具规模。

沈阳的奉天纺纱厂创设于 1923 年 7 月，属官商合办，资本 300 万元，先后从美国购进纺织机 200 架、纺织锭 2 万锭。全厂占地 280 亩，有工人约 1300 余名。主要生产棉纱、棉布、染色纱、线袜四种。在辽阳设有分厂，是全省乃至东北最大的自办独立经营的纺织厂，其产品颇受国人欢迎。

东兴色染纺织公司创于 1924 年 9 月。当时由留日高工色染科毕业生、辽中县人陈维则（陈楚才）等人发起，集资 5 万元，占地 30 亩，在沈阳小东边门外（现中捷友谊厂东南角）开办东兴色染纺织公司。该公司机器全部由日本购进，为东北首家采用新式机器染色的工厂。产品优良，压倒同行各家，从而发展极为迅速。1931 年总资本达 50 万元，有机器 400 台，职工近千人，是辽宁民族工业中颇有影响的企业之一。